

## 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 澳門的葡文《蜜蜂華報》（1822～1823）

譚志強、吳志良 \*

### 《摘要》

由於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的簡短介紹，許多學者專家都知道，於1822年在澳門出版的葡文報紙：《蜜蜂華報》，是中國領土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然而，《蜜蜂華報》究竟是一份怎麼樣的刊物呢？為甚麼它會在澳門而不是別的中國地區首先出現呢？為甚麼它會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而不是別的時候在澳門出現呢？《蜜蜂華報》本身的大致內容是如何的呢？它又有甚麼特點呢？本論文便是針對它的緣起、發展、內容和影響力的一個初步的探討。

關鍵詞：中國、新聞史、報紙、葡萄牙、蜜蜂華報、澳門

### 壹、只聞其名未見其面的葡文《蜜蜂華報》

自戈公振在其《中國報業史》（1926）中，首次提及葡文《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後，許多中國新聞史著作都會提到《蜜蜂華報》這份於1822年在

---

投稿日期：1997年8月5日；通過日期：1998年3月3日。

\* 譚志強現為中國時報香港新聞中心主筆。E-mail:camoes@hkstar.com

吳志良現為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委員。E-mail:fmac@macau.ctm.net

澳門出版，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但是，即使第一個提及這份報紙的戈公振，他本人有無確實親眼看過這份報紙，是非常值得我們懷疑的。因為，如果他真的見過《蜜蜂華報》，他便不可能寫出下面如此簡短但卻出現了四處錯誤的段落：

「葡文報紙

▲澳門

A Abelha da Chine（意譯蜜蜂華報）發刊於一八二二年（道光元年）九月十二日。一八二四年，入一急進黨之手，易名Gazetache Macao。越二年停刊。」（戈公振，1964:114）

這短短的一段文字，至少有四個明顯的錯誤：（一）《蜜蜂華報》的正確葡文拼法是A Abelha da China，不是A Abelha da Chine；（二）《蜜蜂華報》於1823年12月26日便正式停刊，根本不可能於1824年易手，更不必說甚麼「越二年停刊」；（三）當時澳門並沒有甚麼「急進黨」，只有支持葡萄牙立憲運動的「立憲派」（立憲黨），和支持舊體制的「保守派」（保皇黨）。《蜜蜂華報》是由「立憲派」於1822年9月12日創辦，在1823年9月23日便被「保守派」接管，稱之「一八二四年，入一急進黨之手」，實不知其根據何在；（四）澳門「保守派」於1824年1月3日創辦來取代《蜜蜂華報》的報紙名為Gazeta de Macau（暫譯《澳門鈔報》），不是Gazetache Macao。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的兩家出版社，先後為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再版了兩次，不過，有關《蜜蜂華報》的描述，兩個版本都無一字更動（戈公振，1985:69）。戈公振弟弟戈寶權於1983年11月主編的《談戈公振和他的「中國報學史」》裡面的「附錄」：〈中國報學史史實訂誤〉，也未就有關《蜜蜂華報》的描述，提出任何新的材料（楊謹靜等，1983）。<sup>(1)</sup>換言之，海峽兩岸曾經出版過的所有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版本，都沒有對介紹《蜜蜂華報》時出現的錯誤之處，作出補充或更正。

其他的中國報業史或中國新聞史著作，對這份報紙的描述與戈公振相比，其簡短程度亦差不多。例如，過去多年以來都是台灣唯一的「中國新聞史」教科書，本來由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出版的：《中國新聞史》（目前已改由三民書局印行），裡面有關《蜜蜂華報》的描述是：「以時間論，外人報紙以葡文為最早（一八二二年發行於澳門之A Adelha da Chine「蜜蜂華報」）」（曾虛白，1977:158）。在此，該書不但明顯繼承了戈公振把China拼成Chine的錯誤，還把Abelha（蜜蜂）錯排成

Adelha。

然而，真正的葡文《蜜蜂華報》究竟是一份怎麼樣的刊物呢？為甚麼它會首先出現在澳門而非別的中國地區之上呢？為甚麼它會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而不是別的時候在澳門出版呢？《蜜蜂華報》本身的大致內容是如何的呢？《蜜蜂華報》的內容有甚麼特點呢？《蜜蜂華報》在學術研究上具有甚麼的價值呢？本論文便是針對這些問題所作一個初步的探討。(2)

## 貳、葡文《蜜蜂華報》原件的發現與出版

經過一百七十多年的沉睡後，由於一些有心人士的苦心尋找，最近澳門的一些學者才發覺葡文《蜜蜂華報》的絕大部分原件，一直都收藏在澳門市政廳圖書館和葡萄牙本土的一些古籍圖書館裡。為方便澳門及海外研究者參閱這份在中國領土上印行出版的第一份外文報紙，除了至今仍未找到的一期（四頁）之外，作為澳門歷史重要研究和贊助機構的澳門大學和澳門基金會，已經在1994年將《蜜蜂華報》的其他全部刊號，照相翻印成一冊八開（28.5 cm × 21.5 cm × 3.2 cm）大小的精裝合訂本（Universidade de Macau e Fundação Macau ed., 1994），在澳門正式出版。

通過這份由原件照相翻印而成的合訂本，再配合一些葡萄牙史與澳門史的相關資料，目前我們已經可以大致上描繪出葡文《蜜蜂華報》的輪廓。簡言之，《蜜蜂華報》是一份以葡萄牙文印刷，在澳門出版發行的政治性週報，出版時間是1822年9月12日至1823年12月26日，前後共出版了六十七期。它不但是當時葡萄牙立憲黨澳門分部的機關報，也是當時以立憲黨為執政黨的澳門葡人自治機構（即議事會Leal Senado，今稱市政廳，俗稱金巴喇Camara）的政府公報（gazeta）。

## 參、葡文《蜜蜂華報》的出版背景

自葡萄牙人於1553年在澳門定居以來，澳門便長期成為東方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心。1588年，第一部西方的鉛（活）字印刷機，自葡萄牙運抵澳門，並於同年出版了澳門的第一本西方出版品：《基督的兒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1588）（Bonifacius, 1988）（見附件一）。其後，以義大利天主教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為首的西方傳教士在澳門陸續印刷了許多宣傳基督教教義的小冊子。連英國新教的首位來華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十九世紀初抵達中國時，也是首

先以澳門為傳教據點。<sup>(3)</sup>再加上自美國大革命（1776）、法國大革命（1789）爆發以後，在美洲和歐洲興起的（革命型）政黨報紙和（攤型的）大眾化報紙的觀念，也因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陸續傳入葡萄牙及其海外社區。因此，由中國和葡萄牙人共同管理，且為當時唯一的外國人長期居留地的澳門，<sup>(4)</sup>出現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無論就物質條件或精神條件（必要因素）而言，都是絕不稀奇的，問題只在有無碰到誘發出現近代報紙的偶然性因素（契機）而已。

如同英國的政黨報紙，在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立憲黨、保皇黨之爭時最為蓬勃一樣，澳門之所以會在1822年首先出版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葡文《蜜蜂華報》，也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葡萄牙立憲黨與保皇黨在澳門發生的激烈政治鬥爭的契機下促使誕生的。

不過，為何葡萄牙本土的劇烈政治變動，竟會對遠在萬里之外，而且是中國領土的澳門地區產生巨大影響，還令澳門出現了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這個問題倒是要首先要澄清的，因為，在國家主權必然互相排斥的常理下，遠在萬里之外的里斯本，竟然可以對中國領土的澳門產生嚴重影響，這種現象是與一般常理不相吻合的。

所以，要了解《蜜蜂華報》之所以產生，便必須要先說明葡萄牙本土的政治變化，澳門葡萄牙人自治機構的政治變化，和中國、葡萄牙都同時在澳門行使主權的「雙重主權」統治的特殊政治結構等似乎與報紙本身無關，但卻是令它得以產生的一些必要的外部條件。

### 一、葡萄牙本土的政治變化

1807年11月27日傍晚，由於拿破崙皇帝（Napoleon Bonaparte）的法國軍隊入侵葡萄牙，以攝政王約翰王子（Dom Joao，即後來於1816年才正式繼位的約翰六世D. Joao VI）為首的葡萄牙王室出逃巴西，以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為臨時首都。葡萄牙皇室的這次出亡，一去便是十四年之久。法軍統治葡萄牙本土兩年後，英軍在葡萄牙北部的波爾圖（Oporto）登陸，葡萄牙本土於是便在其後的好幾年內，成為法軍與英軍的戰場，直到1814年英國威靈頓公爵（Lord 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將法軍完全趕回比利牛斯山以北為止。事實上，自1814年起，葡萄牙本土的真正首腦是遠在巴西的攝政王約翰所不得不任命為葡萄牙陸軍元帥的英國公爵貝雷斯福（Lord William Carr Beresford）將軍。然而，此舉引起了葡人的普遍反感。不但如此，葡萄牙國王的長期流亡巴西，也令接觸到拿破崙軍隊帶來的法國大革命思

想的葡萄牙人民，萌生了建立「立憲民主」體制的念頭。

1820年8月，波爾圖發生了一場由葡萄牙立憲黨人士發動的軍事政變，起義者不久之後便在里斯本成立了一個「軍事執政團」（*junta*），控制葡國。這個軍事執政團不但成功地令前往巴西與約翰六世商議的英國貝雷斯福將軍無法返回里斯本，同時也決定應該由一個經民主選舉產生的葡萄牙國會，於1821年1月在里斯本起草第一份的《葡萄牙憲法》。不但如此，為加強本身的合法性，執政團還請求當時流亡在巴西的約翰六世歸國主政。1822年2月，葡萄牙國會正式通過了第一份的《葡萄牙憲法》，並經約翰六世批准頒佈。不過，政治特權被剝奪的葡萄牙「保皇黨」，卻時時在準備復辟。

1823年5月27日，隨同約翰六世自巴西返國的葡萄牙王子米蓋爾（Dom Miguel）在里斯本成功地發動一場以廢除憲法，恢復君主專制為目的的軍事政變。於是，葡萄牙又恢復了過去的君主專制統治。然而，嘗試過自由民主滋味的葡萄牙人民，其心態已經不可能再滿足君主專制政體，自此葡萄牙的政局，便陷入了一段以「保皇黨」與「立憲黨」為兩大陣營，不斷發動政變，在民主政治與君主專制之間，翻來覆去長達十一年之久的混亂時期，直到1834年5月米蓋爾王子在內地的科英布拉（Coimbra）戰敗，與女王瑪利亞二世（D. Maria II）於同年9月正式登上王位，才暫告停止（Nowell, 1952:177-190）。

換言之，自1807年到1834年，由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葡萄牙在這二十七年內，政局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狀態之中。這些重大的內部震盪，便通過其殖民統治體制，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以帆船貿易所能達到的最快速度，迅速地自里斯本傳播到葡萄牙的海外屬地、領地，令葡萄牙的海外屬地、領地政局，出現前所未有的巨變。

## 二、澳門葡人自治機構的政治變化

自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南宋政府於廣州府之下設立香山縣以來，位於香山縣最端的澳門，便在中國政府的有效統治之下。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來華貿易的葡萄牙人以中國稱為「賄賂」，葡國稱為「交租」的方式，在澳門上岸居留，並從此定居下來。1560年，葡萄牙人在澳門組織了一個包括三名最高長官：地方長官（*capitao da terra*）、大法官（*ouvidor*）、主教（*bispo*）的自治機構——議事會，在中國政府的默許下，長期行使高度自治。在此政治架構下，作為葡萄牙王或果阿（Goa）葡印政府代表的澳門總督（*governador*），其地位不過只是一個專管軍隊的「兵頭」或「駐軍司令」而已，實際上在澳門葡萄牙人社區行使管轄權的是澳門葡萄

牙人組成的一個自治機構（議事會），而除了收取地租和關稅及對澳門華人行使有效管轄之外，明、清兩朝中國政府也很少介入或干預澳門葡萄牙人的內部事務，讓澳門葡萄牙人享有高度的自治權（譚志強，1994a:62-68，118-125；吳志良，1995:8-19）。雖然葡萄牙在澳門建立了自治機構的現實，曾令明朝政府一度非常困擾，但是，明朝政府最終還是對澳門這塊已經租借給葡萄牙人居住的領土，通過各種與傳統手段有異的變通手段來行使有效統治（Fok, 1991）。這種有效統治，到清朝成立後仍未改變，直至1849年才因當時的澳門總督亞馬拉（Amaral）發動的一場驅逐駐澳中國官員的「政變」後才中止，令葡萄牙政府擁有對澳門的完整管轄權。

換言之，當時的中國政府是以一種類似唐代「蕃坊」的管理方式去管理澳門，只對澳門非常有限地去行使本身的主權（王權），而葡萄牙王國也憑藉其特殊的殖民統治體制，通過葡印（果阿）政府對澳門葡萄牙人社區行使有限管轄，這便令澳門出現了一種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中國和葡國都同時對澳門擁有管轄權。中國政府有效管轄澳門華人和涉及澳門華人的葡人事務，葡萄牙王國則對澳門葡人行使有效管轄；如果中葡雙方發生有關管轄權的法律衝突，則由中國政府行使「終審權」的「雙重主權」統治（吳志良，1995:15-19；譚志強，1994b；Oliveira, 1994:172-174；Tam, 1994）。換言之，任何北京或里斯本出現的巨大政治變動，都可以對澳門內部政局產生相當的影響，而不是只有中國這個主權國的行為，才可能對澳門產生嚴重影響。

因此，葡萄牙本土上發生的一些比較劇烈的政治變動的影響力，便會通過葡萄牙當時的複雜殖民統治體制，自里斯本經過非洲、印度（果阿），傳到中國領土的澳門，對當時以葡萄牙人爲主要居住人口的澳門，產生巨大的衝擊。

### 三、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三年的「澳門政變」

自法律觀點來看，澳門葡萄牙人社區內部衝突的憲法根源實出於1783年4月4日，由葡萄牙女王瑪莉亞一世（D. Maria I）頒佈的《皇室制誥》。這份制誥徹底改變了澳門葡人自治機構的政治架構，讓澳門總督獲得了最高且全面性的權力，漸漸成爲澳門葡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議事會的權力則被大量剝奪，日漸淪爲一個澳門總督的諮詢機構；與此同時，大法官的權力亦大力擴張。代表澳門土生葡人利益的議事會，便與代表里斯本葡人利益的澳門總督，及代表果阿葡印政府利益的大法官，衝突頻生，最後達到水火不相容的嚴重地步。

1820年8月葡萄牙本土立憲黨起義成功的消息，不久之後便陸續通過各種管道傳到澳門，令早已想自澳門總督和大法官手上奪回自治權力的澳門立憲黨人士大爲鼓

舞。當時澳門「立憲黨」的領袖是土生葡人領袖的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即中國官方文書裡的「保連玉」）中校，「保皇黨」的領袖是身兼地方長官、司庫官等要職於一身的大法官亞利鴉架（Miguel de Arriaga Basco da Silveira，即澳門人俗稱的「雅廉訪」），與澳門總督歐布基（José Ozório de Castro Cabral de Albuquerque）。

自1822年初開始，澳門市民便陸續出現一連串向議事會請願或向葡萄牙國王上書的事件，要求由保皇黨掌控的澳門葡人政府，恢復為原來由議事會自治的政治架構。1822年2月16日，在澳門市民的強大壓力下，保皇黨控制的澳門葡人政權被逼宣誓效忠《葡萄牙憲法》。但是，由於保皇黨遲遲不肯交出權力，到了同年8月，澳門葡人政權便因要求改革的市民不斷發起的騷動，慢慢陷入無政府狀態。8月17日，澳門立憲黨領袖阿美達醫生（José da Almeida Carvalho e Silva）趁議事會開會時，向議事會遞交了一份由八十三個澳門市民聯名的抗議書，指控大法官亞利鴉架瀆職，揭開了政治鬥爭的序幕。8月19日，澳門市民召開選舉大會，會議決定恢復1784年之前由議事會主導的自治體制，授予新一屆通過澳門市民選舉產生的議事會擁有不受澳門總督和大法官控制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的權力。身為保皇黨領袖的大法官亞利鴉架被剝奪一切職務和權力，原澳門總督歐布基則被剝奪大部分權力，再度成為只擁有軍權的「兵頭」；議事會主席則由澳門立憲黨領袖巴波沙中校出任。

9月12日，巴波沙中校與阿美達醫生共同創辦了《蜜蜂華報》，並由道明會籍的阿馬蘭特（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神父主編。該報在澳門官印局（Imprensa Nacional）印刷，每逢周四出版，是一份週報。它不但是澳門立憲黨的機關報，同時也是澳門議事會的政府公報。這份新政權的喉舌，大力主張立憲主義，像蜜蜂般狂螫澳門的保皇黨人，迅速地便成為澳門立憲黨人的象徵。

1823年3月，亞利鴉架與歐布基由於被指控在澳門策動復辟政變，被議事會驅逐出境，但是，亞利鴉架卻在遣送途中，趁機跳上一條小船逃往廣州，等候機會就近指揮澳門保皇黨人的反撲行動。同年6月初，葡萄牙本土發生復辟政變的消息傳到果阿，葡印政府總督金巴拉（Dom Manoel da Camara）馬上派出以包也（Joaquim Mourão Garcez Palha）為司令，滿載士兵的戰艦「沙拉曼德拉號」（Salamandra），駛到澳門恢復舊政權。6月16日，「沙拉曼德拉號」抵達澳門，令澳門的保皇黨人和潛逃至廣州的亞利鴉架，終於等到了復辟之機。不過，由於兩廣總督阮元已經通過線報知道澳門葡人內部發生問題，派出廣州知府鍾英和署督標中軍蘇兆熊前往澳門查問究竟發生何事，並表示澳門向由中國管轄，不許胡亂鬧事。包也司令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

亦不敢貿然在澳門使用武力，「沙拉曼德拉號」遂暫時自澳門外港的潭仔（Taipa，今澳門國際機場所在島嶼）海面，退泊至九龍大鵬汎海面（今香港維多利亞港），等待季風回航印度。

9月23日，本來停泊在大鵬汎海面的「沙拉曼德拉號」，得到了澳門保皇黨人傳來的消息，突然駛回澳門海面。在澳門保皇黨人士的協助下，包也司令帶領了二百名葡萄牙士兵，於當日凌晨成功潛入了澳門市中心的議事亭前地，在床上逮捕了巴波沙中校，將他押上「沙拉曼德拉號」，解回果阿受審。包也司令同時迅速組成了以澳門主教查辛（Bispo Chacim）和依德費基（João Cabral de Estefique）等保皇黨分子為首的新議事會，下令召回原大法官亞利鴉架，並在澳門大肆搜捕立憲黨人士。於是，大批屬於澳門立憲黨的市議員、神父、修士、律師，甚至一般市民，紛紛逃往廣州、馬尼拉、新加坡等地避難。除巴波沙被押回果阿受審外，《蜜蜂華報》的另一位創辦人阿美達醫生逃到了新加坡（Singapore），成為了當地的名人，並在當地終老；<sup>(5)</sup>主編阿馬蘭特神父則先逃往廣州，再逃至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一時之間，與《蜜蜂華報》有關的重要人士，從此煙消雲散。

而大法官亞利鴉架一回到澳門，首先便在澳門法院前面，當眾燒毀了澳門立憲黨人的象徵：一份於1823年8月28日出版的《蜜蜂華報》。當澳門保皇黨接管了《蜜蜂華報》後，該報還以澳門葡人政府公報的身份，苟延殘喘了幾個月，至12月26日出版第六十七期後，才正式停刊，由1824年1月出版的《澳門鈔報》（Gazeta de Macau）取代（費成康，1988:237-250；Jesus, 1926:270-280）。

## 肆、葡文《蜜蜂華報》的內容與特點

簡言之，葡文《蜜蜂華報》是一份以葡萄牙文印刷，在中國領土的澳門出版的政治性周報，出版時間是1822年9月12日至1823年12月26日，前後共出版了六十七期。它不但是當時葡萄牙立憲黨澳門分部的機關報，也是當時以立憲黨為執政黨的澳門葡人自治機構（議事會）的政府公報。

就內容而言，葡文《蜜蜂華報》保存了大量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有關澳門政局變化和中國政府如何反應的一手資料，其中至少包括：

- （一）議事會之通告、會議紀錄；
- （二）海外部國務祕書向印度果阿（Goa）總督發出的指示和報告，以便指引駐北京主教與中國官員處理有關澳門的事宜；

- （三）印度果阿總督給議事會的信件；
- （四）對大法官亞利鴉架及其生意的調查；
- （五）澳門的政治局勢報導；
- （六）議事會與中國地方當局的往來文件以及省城（廣州）消息；
- （七）議事會與市民的來往信件；
- （八）當時巴黎、倫敦和紐約報紙對葡萄牙政局以及其他事件的報導轉載等。
- （九）自果阿或其他亞洲港口經澳門的船期班次。<sup>(6)</sup>

由於《蜜蜂華報》是一份政黨報紙，它在1822年9月12日「創刊號」頭版刊登的「社論」上便宜稱：「受議事會之託編輯本報，我們認為，作為編輯的主要責任之一是真實坦誠地表達加速取得上月19日的原因。這是難忘的日子，澳門人聚集在自由亭周圍，推翻了多年的專制統治。雖然我們承認，這項任務非我們力量所能完成的，但並未因此不能顯示我們要齊心合力、結束獨裁專政的決心。這次勝利，鞏固了市民的權利和義務，並在大眾的歡呼聲中，依居民的普遍願望建立了臨時政府。」

（Universidade de Macau e Fundação Macau, 1994:1）（見附件二）換言之，它的政治色彩和黨派立場是非常鮮明的。

《蜜蜂華報》的特點則包括：

一、《蜜蜂華報》的出版時間相當短，印數有限，《蜜蜂華報》的讀者群便非常有限，只侷限在主要以澳門為居留地，為數不超過四千四百八十人（即1830年澳門葡籍成年人總數）的在華葡人之內。換言之，它的性質有點類似今天在美國出版的一些華文僑報，是葡萄牙的一份海外葡人社區報紙（僑報）。而且，由於印數太少，當時能見到該報的人士已經不多，因此，在未出現1994年版影印本之前，一般學者不要說去研究它，就算是見見它的真面目，都是很困難的。

二、至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葡萄牙早已沒落多時，外國對華貿易重心亦已轉至英商、美商身上。而且，在華外商裡面，除瑞典駐澳門領事龍思泰（Andrew Ljungstedt）外，懂葡萄牙文的並不多。因此，即使在出版當時，《蜜蜂華報》對其他在華外商是沒甚麼影響的。而且，由於當時澳門城內的中國人仍由中國官員有效管轄，且華人中懂葡文的也不多，它對澳門華人也是沒有甚麼影響的。換言之，《蜜蜂華報》能影響的主要對象，是當時的澳門葡人社區。

三、與鴉片戰爭之前，外國人在南洋或澳門、廣州等地創辦的其他近代報紙比較，《蜜蜂華報》既不同於由基督教傳教士們為宣傳教義而出版的中文報刊或中英文合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天下新聞》、《東西

洋考每月統記傳》、《澳門雜文編》、《依徑雜說》等），也不同於由外商們為調查中國虛實，互通消息，以便外商認識中國官方與民間態度的中英文商業報刊（包括《各國消息》、《廣州紀錄報》或《香港紀錄報》、《廣州周報》、《商業行情報》、《中國差報與廣州鈔報》、《香港鈔報》、《中國叢報》、《中國之友》等），而是另成一格的「葡文政黨報紙」或葡萄牙人在華興辦的「僑報」。這類型的報紙，除《蜜蜂華報》外，至少還包括：《澳門鈔報》、《澳門編年報》（A Chronica de Macau）、《帝國澳門人報》（Macaista Imperial）、《澳門政府公報》（Boletim Oficial do Governo de Macau）、《澳門郵報》（O Correio）、《商報》（O Commercial）、《真愛國者》（O Verdadeiro Patriota）等。（方漢奇主編，1992:283-285）然而，可能由於懂葡文的中外學者不多，且有關資料參閱不易，這類在華印行的葡文報紙，目前仍是乏人研究的。

四、既然《蜜蜂華報》是一份在澳門出版的葡文政黨報紙，它報導的消息自然便集中在澳門本身發生的一些與里斯本政局變化有關的事務，或且澳門葡人內部的政治論爭之上，只有極少數篇幅提到了議事會與中國地方當局的往來文件以及省城（廣州）消息。因此，除了這些中國與澳門往來文件及省城消息之外，即使對研究鴉片戰爭（1839～1842）之前中國通商口岸歷史的中外學者來說，這份報紙包含的資料，實際上也是沒有太多用處的。《蜜蜂華報》只能因為它是第一份在中國領土上出版的外文報紙，在中國新聞史上占有無可置疑的重要地位。

五、由於澳門一直是葡萄牙人對華貿易的最重要基地，居民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間接倚靠商業為生，為了迎合在華葡人的需求，《蜜蜂華報》上面亦刊登了不少讀者想知道的，與商業有關的重要消息，包括船期、議事會和中國地方當局的往來文件、省城（廣州）消息等。換言之，《蜜蜂華報》也包括了一些大眾化報紙的內容，並非純粹只是宣揚立憲的政黨報紙。

六、由於《蜜蜂華報》的原始資料（均為葡萄牙文）影印本，久久未能正式面世，成為學者專家方便參考的對象，有關《蜜蜂華報》的二手及三手資料（大多數亦為葡萄牙文）也不多，且分散在里斯本、澳門、香港和新加坡等相距甚遠的地區，研究資料的缺乏、語文上的陌生、資料分布得太過零散，遂成為中國新聞史學者深入認識《蜜蜂華報》的嚴重障礙。所以，許多學者專家在提及《蜜蜂華報》時重複戈公振的錯誤也是在所難免的。

## 伍、結論

總的來說，在澳門出版的中國第一份近代外文報紙：葡文《蜜蜂華報》，是一份出版時間比較短，讀者相當有限，而且影響力也只侷限在澳門葡人社區之內的「政黨報紙」（政府公報）。與其他早期的中國近代報刊比較，《蜜蜂華報》是一份另類的「葡文政黨報紙」，既不同於基督教傳教士們為宣傳教義而出版的中文報刊，也不同於在華外商為調查中國虛實，互通消息，以便外商認識中國官方與民間態度的英文報刊，即使《蜜蜂華報》上面亦刊有一些與對華貿易有關的消息。就研究鴉片戰爭前中國通商口岸歷史的角度來看，葡文《蜜蜂華報》的幫助可能是相當有限的。

不過，對研究澳門近代史、澳門政治制度變遷、澳門主權問題（包括中葡兩國如何分享澳門的統治權、澳門葡人自治機構的權力及其限制等）、澳門的政治發展（包括葡萄牙里斯本當局的政局變化如何通過一套殖民制度安排而對遠在萬里之外的澳門產生影響、中葡兩國對澳門內部事務影響力的消長等）之類問題的學者專家來說，葡文《蜜蜂華報》裡面所記載的資料，卻絕對是一個寶庫，很值得學者專家進一步去探討。因為，澳門長期存在的「雙重主權」統治，即由中國政府擁有最高主權，澳門葡萄牙人自治機構則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殊政治結構，與北京政府已經在香港並計劃在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政治安排，呈現出高度的相似性。所以，在華葡萄牙人運用甚麼手法，在中國主權之下於澳門維持了「高度自治」達數百年之久，《蜜蜂華報》裡的一些有關記載，關心港澳前途的學者專家，實在有必要去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 註 釋

- (1) 中國大陸曾於1950年代出版過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的再版初印本，但現已絕版多時。1985年由中國新聞社（新華社附屬機構）出版的第二版版本，由於印數不多，目前市面上也難以一見，只在一些圖書館和學者專家中藏有；戈寶權於1983年主編的《中國報學史史實訂誤》也是如此。〔本論文中有關上述兩書的資料，分別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博士生程曼麗，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方漢奇提供〕。
- (2) 這篇論文的未定稿曾以與會論文形式，初次發表於1995年6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時，當時就引起了不少港澳歷史

學者的注意和提出批評。然而，由於與會學者提出的修訂意見比較多，而修訂論文時需要參考的有關資料則非常稀少與難以尋找，兩位作者也公私兩忙，故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後，本論文才完成第一稿。1997年11月27日至29日，作者之一者譚志強親自到北京和方漢奇教授及程曼麗副教授進行訪談，及對論文作出最後修訂後，本論文才正式定稿。

- (3) 由英國新教聖公會派遣來華的馬禮遜牧師，於1807年（清嘉慶十二年）取道美洲，抵達天主教（舊教）對華傳教中心的澳門後，為避免被以天主教為國教的葡萄牙執政當局的迫害，他最初是以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身份作為掩護，祕密地進行傳教工作的。由於無法公開傳教，馬禮遜牧師在澳門的首次傳教工作並不順利，不過，中國近代第一個華人基督教（新教）徒、雕版工人蔡高，卻是馬禮遜牧師幾經辛苦之下，才於澳門當地一個（至今仍未能確實考證所在的）小海灣上為他施行洗禮並吸收入教的。但是，由於新教「入侵」澳門的消息外洩，不久之後，蔡高便在澳門葡萄牙人的陷害下，被當時有效管理澳門華人的香山縣丞逮捕入獄審問，並在監獄裡不明不白地死亡。為紀念這個第一位信奉新教，也是首位為新教「殉道」的澳門基督教徒蔡高，英國聖公會後來還特別在澳門白馬行街，建立了一間至今（1997年）仍在正常招生教學的「澳門聖公會蔡高中小學」來紀念蔡高。英國聖公會後來吸收的印刷工人梁發（即梁亞發，後著有觸發太平天國革命的《勸世良言》），只能算近代中國的第二位華人新教徒。所以，澳門的確是馬禮遜牧師的首個傳教地點，最後也成為他一家四口（馬禮遜牧師、馬禮遜夫人、James Morrison、馬儒翰）的埋骨之處。此中詳細經過，可參閱：李志剛，《基督教在華早期傳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52-113；以及「羅伯馬禮遜墓碑」、「馬禮遜博士去世百年紀念碑誌」（此兩碑刻均仍樹立在今澳門市中心賈梅士公園門口右邊的東印度公司墳場，亦即馬禮遜牧師一家四口埋骨地點之內）及「蔡高先生紀念碑」（此碑刻現藏今澳門聖公會蔡高中小學內）。
- (4) 除澳門外，當時中國的另一個可以允許外國人長期居留的地點，是位於原廣州城南面，瀕臨珠江河面的十三行（中國行商租給外商居住的商館）。但是，中國政府不但不准外商離開十三行的圍牆之外，也不准外商攜帶眷屬到廣州居住，而且，每年冬天來臨，貿易季節結束，外國居民也要全部離開廣州，集體坐小船經珠江三角洲的內河，轉移到澳門居住，要到第二年貿易季節再來臨前，才准集體坐小船沿原路重返廣州；一般時候，則不斷有航行於珠江三角洲內河的小船，為

廣州和澳門的外商傳遞信件和消息。因此，當時的澳門不只住有葡萄牙人，也同時住有到中國貿易的各國商人、水手及其他辦事人員，包括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瑞典人等，各國的大商行也都在澳門設有對華貿易辦事處及擁有大宅和莊園，故實際上是中國當時最大的一個國際社區。於是，有關西方世界的重要消息和發明，便通過西方商船和人員的往來，很快地傳入澳門和廣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外國商人在廣州和澳門的具體生活情況，可以參閱於1825年抵達廣州，旋即被派往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中文十六個月（1825～1826）之後，再於1826年底返回中國，在廣州和澳門生活了幾十年的美商旗昌洋行合夥人威廉·C·亨特的兩本名著：（美）威廉·C·亨特著，馮樹鐵譯（1993），《廣州番鬼錄，1825～1844：締約前「番鬼」在廣州的情形》，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原名：William C. 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1882）；（美）亨特著，沈正邦譯（1992），《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原名：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China*, 1885）。被奪權的大法官亞利雅架自澳門出逃廣州而不是其他地方，並在廣州策動澳門保皇黨發起「反政變」，原因亦在於身處廣州消息比較靈通，一方面可以得到歐洲政局的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比較方便遙控澳門政局。

- (5) 要對《蜜蜂華報》的內容及其影響，作更具體的內容分析，實非一篇一萬五千字以內的學術論文所能企及。如果學者專家希望進一步了解《蜜蜂華報》，可以在日後參考目前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方漢奇指導，副教授兼博士生程曼麗撰寫的博士論文：《蜜蜂華報：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報刊，中國領土上的第一份外文報紙，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報紙》（暫時名稱）。此博士論文的全文約十五萬字，其中包括對《蜜蜂華報》全部內容的內容分析，初稿將於一九九八年初完成，並計劃於同年五月進行論文答辯（口試）；如果論文答辯順利通過，澳門基金會已計劃將此論文馬上印行，於同年12月底之前出版，連同附錄部分，全書約在十八萬字至二十萬字之間。如果想先睹為快，此博士論文的部分重要內容，已經決定於中國大陸出版《新聞學論集》、《新聞與傳播研究》、《新聞大學》，及日本出版的《東瀛探索》（日文）的1998年第一期或第二期上分別發表，以便接受外界的指正。另外，澳門大學中文系大眾傳播學助教林玉鳳正在撰寫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碩士論文：《澳門的葡文報紙》（計劃於1998年5月進行口試）第一章，也將會詳細分析《蜜蜂華報》的內容；如果此碩士論文順利通過，澳門基金會亦會資助該論文於1998年底之前在澳門出版。

- (6) 阿美達醫生後來成為新加坡開港時期的名人之一，至今新加坡舊市區仍有一條街道是以他命名的。位於聖淘沙島上的新加坡歷史博物館內，也有一個阿美達醫生的蠟像陳列在內，以為紀念。本文作者之一的譚志強，曾於1997年2月親自前往新加坡三日，實地調查和蒐集阿美達醫生後半生在新加坡生活的有關資料。

## 參考書目

- 李志剛（1985）：《基督教在華早期傳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李家園（1989）：《香港報業雜談》。香港：三聯書店。
- 方積根、胡文英（1989）：《海外華文報刊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新華出版社。
- 方漢奇（1991）：《中國近代報刊史》，四印。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 方漢奇主編（1992）：《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方漢奇等編著（1983）：《中國新聞事業簡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楊光輝等編（1986）：《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北京：新華出版社。
- 許煥隆（1988）：《中國現代新聞史簡編》。許昌：河南人民出版社。
- 梁家祿等著（1987）：《中國新聞業史》，二印。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 曾虛白主編（1977）：《中國新聞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戈公振（1964）：《中國報學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賴光臨（1987）：《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賴光臨（1992）：《中國新聞傳播史》。台北：三民書局。
- 澳門日報（1993）：〈澳門新聞傳播事業〉，澳門日報（編印）《澳門手冊（1993）》，頁165-167。澳門：澳門日報社。
- 林昶（1994）：〈新聞出版〉，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頁284-295。澳門：澳門基金會。
- 費成康（1988）：《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3）：〈重新評價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學術月刊》，一九九二年八月號。上海。
- 吳志良（1995）：《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
- 譚志強（1994a）：《澳門主權問題始末》。台北：永業出版社。
- （1994b）：〈澳門主權歸屬爭議的國際法分析〉，《文化雜誌》（中文版），

19:147-152。

- Bonifacius, Ioanne (1988). 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 reprint ed..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 Bruning, Harald Chr. (1986). The Position of Macau in the Portuguese Constitution since 1822. Hou Keng: Journal of the Macau Society of Social Science, 1 (Sept. 1986):12-21.
- Fok, K. C. (1991). The Ming Debate on how to accommodate the Portugues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acao formula: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 and early Chinese reaction. Revista Cultural, 13/14 (Jan./Jun. 1991):328-344.
- Jesus, C. A. Montalto de (1926). Historic Macau. 2nd. ed.. Macau: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and Tipografia Mercantil.
- Macau, Universidade de, e Fundação Macau (Eds.). (1994). A Abelha da China (1822 ~1823).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e Fundação Macau.
- Nowell, Charles E. (1952). A History of Portugal. New York: D. Van Nostrand Company Inc..
- Oliveira, Celina Veiga de (1994). A Questao da Soberania em Macau.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Sobre Intercambio Cultural Oriente-Occidente, pp.164-174. Macau: Fundacao de Macau.
- Opello, Jr., Walter C. (1985). Portuga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Silva, Henrique Rola da (1991). A Imprensa Chinesa de Macau. Macau: Gabinete de Comunicação Social.
- Silveira, Jorge Noronha e (1991). Subsi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 (1820~1874), Macau: Publicações-O Direito.
- Tam, C. K. Camões (1994). A Disputa Sino-Portuguesa Sobre a Posse da soberania de Macau. In Tang Si Peng, Wong Io Fong, Luis Sa Cunha (Eds.), Actas Das Comunicacões: I Seminario Internacional de Historia e Cultura de Macau., pp. 193- 201. Macau: Instituto de Estudos Culturais de Macau.

本論文得以完成，有賴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周佳榮博士、香港珠海書院新聞暨大眾傳播系助理教授老冠祥博士、香港禮賢會牧師李志剛博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方漢奇、副教授程曼麗等的指正和幫助，謹此致謝。

# Th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Newspaper of China: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of Macao

Camões C. K. Tam, Zhiliang Wu \*

##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shortly introduction by Mr. Gou Gong Cheng in History of Press of China (1926), a number of students had known the "A Abelha da China", which was published in Portuguese at 1922 in Macao, is the first modern newspaper of China. But, because lack of first hand materials, there is no person to research the "A Abelha da China" before 1994. This essay is a primary inquiry to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contents and influence of the "A Abelha da China", and shortly evaluate its value in history of press,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d history of Macao, respectively.

Keywords: China, history of press, newspaper, Portugal, Abelha da China, Macao

---

\* Dr. Camões C. K. Tam is staff writer of Hong Kong News Center of China Times.  
Dr. Zhiliang is Director of the Macao Foundation.